



zhongguo jindai shishi luncong

中国近代史事论丛

饶怀民 著



岳麓
学术
文丛



zhongguo jindai shishi luncong

中国近代史事论丛

饶怀民 著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事论丛/饶怀民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0
ISBN 978-7-80761-406-7

I. 中... II. 饶... III. 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3926 号

中国近代史事论丛

作 者: 饶怀民

责任编辑: 管巧灵 刘雪琳

封面设计: 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8.875

字数: 456 千字

印数: 1500

ISBN 978-7-80761-406-7/G · 926

定价: 48.00 元

承印: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我缘何选择研究中国近代史（代前言）

一个人如何选择自己终身从事的职业？如何树立理想？如何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大都与其本人的生存环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关连。

我出生在华容县终南乡五谷村，距县城 15 公里。乡人原本就有所谓“五谷坳，鬼挖窖”的说法^①，可以想见其地理环境之闭塞程度；幸运的是，离我家不远的后山却有一座风景如画的山峰，海拔 150 余米，绵延数公里，峰形活似一头仰天长啸的雄狮，开始人们称其为啸狮山，后来传说大禹治水时到过此地，人们为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遂将啸狮山改名为禹山，相传西汉惠帝年间，令宣议大夫张汉臣在禹山之巔主修禹王庙，分前殿、中殿、后殿三层，中殿供奉禹王铜像。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堪称滨湖一绝。以后历朝虽有扩建，但其庙址、庙向、庙名一直沿袭下来，未曾改变。唐肃宗李亨在位时曾亲自登临禹山祭祀禹

^① “挖窖”是睡觉的俗称。过去，乡人一般称睡觉为“挖窖”，现在有些地方仍然还有这种说法。

王，明代诗人孙宜有句云：“旁瞻禹庙肃王祀，俯瞰章台雄霸图。”^①明、清两代皆以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日国祭禹王，届时禹山附近的群众敲锣打鼓，杀猪宰羊，仪式庄严，观者如堵。清咸丰年间，五谷坳秀才陈共才在禹王庙之东侧建有文昌阁，为名儒聚会讲学之所，曾一度享有华南书院之美誉。山顶苍松翠柏，山间泉水叮咚，历代以来，吸引了不少诗人墨客来禹山览胜，唐、宋、元、明、清几代尚有 30 多首讴歌禹山胜景和禹王治水业绩的诗词；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亦曾登临禹山，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描写禹王庙的诗作有云：“禹庙空山裹，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桔柚，古屋画龙蛇。”^②沿禹山东行数公里，便是烟波浩淼的东湖，湖周长约为 50 公里，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著名的淡水鱼养殖基地，曾创下中华第一网 200 万公斤的记录，可见其湖面之大，盛产鱼虾之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形胜，我家祖祖辈辈就生长、繁衍在这块热土上。我童年时代到禹山脚下砍过柴，放过牛；到东湖之滨打过猪草，捉过鱼虾。是故乡的土地养育了我，培养了我热爱劳动的习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故乡依然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热爱自己的家乡，不仅是因为此地有名山秀水，而且这里还是著名的佛教圣地。就在我家左侧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便是洪山寺，该寺始建于唐代，经过历代扩建、修缮，已具有相当规模，寺中房屋宽深，供有巨型佛像 3 尊，常年香火不断，寺庙前坪有一千年古樟，需要 13 个成年人手牵手才能合抱住树干，可见其树干之粗壮，古樟枝繁叶茂，四季常青，相传为四川僧人在唐代建寺时所植，人们一直将古樟视为僧人的化身，这给洪山寺平添了几许神秘的色

① 孙宜：《明山草堂歌》，罗俊德编《禹山荟萃》，2003 年铅印本，第 58 页。

② 罗俊德编：《禹山荟萃》，第 1 页。

彩。在我家正前方2公里处是松树岭西照庵，这也是一座佛教庵堂。离我家右侧3公里处，有大乘寺，随着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不断增加，这里逐渐发展演变成为江南小镇。洪山寺、西照庵、大乘寺的晨钟暮鼓伴随我走过了童年时代。置身于这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最容易启迪人们对历史的追思、遐想。

我生于1942年，刚出生不久，日本侵略军第40师团分三路进犯华容，故土沦陷。日军很快抢占了禹山这一制高点，并以此为军事据点，对禹山周边的乡村实施狂轰滥炸。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我出生还未满月，母亲就抱着我躲藏在禹山脚下的丛林深处。有一天，正当日本的飞机在禹山上空盘旋时，母亲抱着我在丛林中穿行，一不小心在我稚嫩的脖子上扎了一根木刺，我本能地发出哇哇的哭声，为不致暴露目标，保护父老乡亲，母亲只得用手紧紧捂住我的嘴唇，不让哭出声来，我几乎被窒息而死。每当母亲向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声泪俱下，这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日本投降后，为使子孙后代勿忘国耻，乡人在禹山之巅自发地竖立起国耻碑，其碑文有云：“时值壬午，日本侵略军占领禹山，焚大禹庙，烧文昌阁，抓民夫，筑狼窝。禹山上下，战壕纵横，碉堡林立，竹竿篱，铁丝网，层层设防；军犬吠，枪炮鸣，声声辱国。昔日圣洁之禹山，顿成人间地狱。忆其时也，日寇下山时，则指人当活靶打，放火烧民宅，当众奸民女，虐拔老翁须，活剌猪牛肉，屎拉锅灶中；”“回山时，将无辜百姓捉拿上山，或捆之于树，唤犬咬食；或绑之于钟，生火烤毙；或穿骨勒杀；或轮奸后刺要，惨不忍睹之罪恶，罄竹难书，令人发指。如斯血雨腥风，时逾两载，逃难者不绝于途，惨叫声不绝于耳。”“幸有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领导抗日，扭转乾坤，振兴中华，故望后人，饮水思源，居安思

危，毋忘国耻。”^①这段乡人朴实无华的文字，却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侵略军的滔天罪行！至今国耻碑高高耸立，碑文犹存。每当我登临禹山，诵此碑文，联想起我儿时的经历，就会激起我对日本侵略军的无比愤恨！引起我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思考。

1950年，我才有机会上小学，那时的小学分为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级小学就设在洪山寺，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父亲学名饶恕忠，字炳秋，毕业于桃源师范，一辈子从事小学教育。父亲除教书之外，专攻书法，毛笔字写得很好，每当春节来临之际，父老乡亲来我家求写祖先牌位和春联者，道为之塞，父亲亦乐而为之，无偿为大家书写，颇受乡人好评。父亲平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讲课的内容丰富多彩，除课堂正式讲授之外，还利用课间余暇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诸如孟母三迁、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之类，用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回到家里，父亲还利用晚上睡觉的时间给我讲述一些近代历史人物的故事，例如林则徐禁烟、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康有为发动举人公车上书、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等等。在初小阶段，父亲在课堂上究竟讲了些什么内容，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但是父亲讲述的历史人物故事、特别是近代历史人物故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父亲的藏书柜中，还珍藏了一幅孙中山的遗像，遗像的两边是孙中山的题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遗像下面是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

^① 徐金阳：《国耻碑文》，罗俊德编《禹山荟萃》，第59页。

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后来，因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我终于找到了孙中山题词遗墨和遗嘱的出处。^①令人吃惊的是，父亲竟能全文背诵总理遗嘱，这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极为深刻。初级小学四年结业后，我升入高级小学，校址就设在松树岭西照庵，名为松树完小。我有幸在这所学校读完高级小学。该校除开设语文、算术等主干课程之外，还增开乡土历史课，重点讲述本地的历史，其主要内容又是讲解有关本地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斗争等等，这些内容对我来说感同身受，颇具吸引力。那时，我从乡土历史教材和校史中获悉，我的家乡还是革命老区，松树完小的前身是新华学校，曾经是革命的摇篮。这所学校最早是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何长工所创办。1923年春，何长工留学法国归来，在上海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回到华容，创办新华学校，成为一所完全小学，何长工亲自担任校长。教学内容除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之外，还增设时事、政治课，每周星期一举行例会，全体师生参加，由校长或邀请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作时事报告，介绍西方教育和海外风土人情，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讲述巴黎公社革命等内容。何长工平时还引导师生员工学习孙中山“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的遗训^②，树立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爱国主义思想。1925年夏，新华学校增设一个补习班，招收有志青年入校学习，并以该校为依

①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系孙中山题词，参见孙中山《为国民党恳亲大会题词》（一九二三年），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遗嘱参见孙中山《国事遗嘱》，《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9~640页。

② 罗俊德：《禹山荟萃》，第78页，参见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

托，利用寒暑假创办平民夜校，开展扫盲和革命宣传活动。从此，华容县的平民夜校陆续开办起来，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在此基础上，乡人陈次藩等人以五谷坳平民夜校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在五谷坳陈家祠堂成立华容县第一个农民协会，陈次藩担任组织部长。迄至1926年底，华容县平民夜校已成立20多所，为华容县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人才，后来，这批学生大都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其中不少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0年7月，时任红八军军长的何长工率部攻克浏阳，7月30日，国民党华容县长宋寿眉（浏阳人）命令团防局将何长工的妻子孟淑亚和两个小孩何光球（5岁）、何光兴（3岁）从南山家中抓捕残杀于华容县城北门放羊洲，同日被害者21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山惨案”。当刽子手行刑时，何长工的两个小孩抓住刽子手的屠刀，连声说：“莫杀我！莫杀我！”但刽子手犹豫片刻之后还是将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残忍杀害，见者落泪，闻者动容！这件事在当地被传至家喻户晓，从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恨，激发了对共产党人所从事革命事业的衷心拥戴和鼎力支持！在松树完小读书的两年时间里，通过对乡土历史教材和新华学校校史的学习，使我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如果说在初小阶段我还是一个头上留着发辫、耳朵上佩戴着耳环、是父母“要我读书”的“小顽童”的话，那么在高小阶段由于受到乡土历史教材和校史的影响，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俨然使我在一两年内变成了一个“我要读书”的“小大人”。那时，虽然还谈不上思考未来的志向，但是从“要我读书”到“我要读书”，这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7年，我有幸考入华容县第一中学。对于一个地处偏僻山区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喜事！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父

亲送我去华容一中上学的情景：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母亲很早就起床为我准备好寄宿的行李，并“起油坨子”为我送行^①。父亲挑着几十公斤重的行李累得满头大汗也不让我挑，我执意要挑，父子俩争着挑，15公里山路，我们足足步行了一个上午，到学校时，父子俩的衣服全都湿透了，但心中仍有说不出的欣喜！因为这是我走出大山的开始。华容一中是一所完全中学，我被分配在初中部第29班，班主任是徐星照老师，他是初中历史课教师，又兼任29班班主任。他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知识且极富正义感的中年人，对学生学习上要求非常严格，而且生活上也 very 关心学生。他教的历史课抓得很紧，他甚至别出心裁地想出一整套考试办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那就是每次上课都要首先提问，对班上两至三名学生进行考查，以求温故而知新，每周周末进行周考，每月月末进行月考，每学期期末进行期末考试，每学年年末进行年终考试，每次考试成绩都要在教室十分显目的位置公诸于众。因此，在这种严格的考试制度下，班里很多同学都十分惧怕徐老师，而我却恰恰相反，特别喜欢徐老师提问和考试，当徐老师讲解到中国近代历史这一段时，我不禁联想到母亲曾经告诉我儿时痛苦的经历，想到禹山之巔乡人立下的国耻碑，想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何长工创办的新华学校，即我的母校，想到乡人陈次藩在家乡五谷坳创办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想到无数革命先烈为振兴中华而不惜牺牲的感人场景！因此，我是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学习这段历史的，尽管那时参加体力劳动所占用的时间比较多，例如参加修建华容大桥、修筑罗帐湖公路、开垦荒山栽红薯、制作耐火砖炼钢铁、参加状元街机械厂、造纸厂实

^① “起油坨子”是当地乡下人家为庆祝自家喜事的一种表达方式，即用糯米磨制成糯浆，糊上芝麻，然后放在菜油锅里炸熟，即可食用。

习、到钱粮湖农场砍芦苇等等，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远远超出了一个初中生的劳动负荷量，但我还是在劳动之余十分疲劳的状态下抓紧时间学习，那时我的理科成绩虽然不是很突出，但我的文科成绩在班上却是名列前茅，特别是历史课的成绩在年级总是排在第一，这或许是徐老师指定我为班上学习委员兼历史课代表的原因吧。在初中阶段，我虽然对中国近代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毕竟还没有将研究中国近代史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职业。作为一名初中生，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在谈及自己的理想时也 and 班上大多数同学差不多，或者是“当一名拖拉机手，在广阔的田野上奔驰”，或者是“当一个石油工人，头戴铝盔走天涯”！抱着这种理想，在初中毕业那年，我不假思索地报考了长沙地质学校，中考结束后，自我感觉良好。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长沙地质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按照一般考生的心理，接到录取通知书应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可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甚至平添了几分忧愁，父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我有什么心结解不开，我简单地说了三句话：“我要读高中，上大学，学历史！”通情达理的父母亲对儿子的心愿表示理解，当即表示：“只要你将来能考取大学，我们再苦也会培养你读完大学。”得到父母的首肯，当天我便拿着长沙地质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赶赴华容一中，要求学校领导能让我继续留校读高中，我自愿放弃去长沙地质学校读书。开始学校领导颇感为难，认为招生分配属于国家统一计划，学校无权决定，若要改变录取通知，必须由学校就此专门写一报告由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因此要等到新学期开学后才有消息。此时，我的班主任徐老师也极力从中转圜，终于使我如愿以偿，当徐老师将这个信息通知我时，我激动万分地握住徐星照老师的手，高兴地对他说：“您真是福星高照啊！”新学期开始后，我被分配到高中部第3班。1960年

是国家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一年，学生每月计划口粮锐减，不少学生因忍受不住饥饿纷纷退学，另谋生路。我们那届学生高中部招收6个班300多人，到高中毕业时只剩下1个班30多人。但不管条件怎样艰苦，我既然选择了继续求学这条路，就应该坚定地走下去！教高中历史课的是唐士尧老师，他的教学方法在全县历史课教师中无疑是第一流的，他的每一个教案都准备得相当充分，他能将深奥的史学理论和丰富的历史知识融为一体，用最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引人入胜，学生几乎都认为听他讲历史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毫无疑问，他很快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使我对历史的兴趣有增无减。特别是当唐老师讲述中国近代史时，中国遭受屈辱和蹂躏的历史在我的脑海中经久难忘，我和同窗学友讨论最多的也还是历史。诸如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有光辉灿烂的文明？中国近代为什么老是挨打？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提出的种种救国方案为什么总是破产？因此，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给现实以指导，开始成为我人生奋斗的目标。于是，我渐渐萌生了想当一个历史学家的愿望。高中毕业那年，在填写志愿表时，我想报考武汉大学历史系。我当时认为，湖北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又是京汉铁路的中枢，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与武汉这座城市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太平天国时期，武汉是太平军与清军鏖战的主战场；武汉也是列强从事经济侵略的重灾区；同时又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举办洋务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在英国等国的策划下，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长江流域策动“东南互保”，企图分裂中国；在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又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因此，我填写的三个志愿都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值得庆幸的是，我竟以历史满分的成绩被武

汉大学历史系录取，以至后来华容一中学生中风传我对历史教科书能“横读倒背”。

当时的武汉大学历史系是五年一贯制，而且其学杂费在同类学校中也不算低。我父亲刚去世不久，家中仅有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妹妹还在上小学，家庭经济一时陷入窘境。不仅五年学杂费难以筹措，就连由农村粮转为国家粮的500斤稻谷也无法解决。就在此时，大队老支书考虑到我家的实际困难，为此，他专门在生产队召开了一次全体社员大会。首先，他向全队社员通报了考取武汉大学的喜讯，同时也指出我所面临的困难，要求大家帮忙想办法。那时，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绝大多数社员连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自然也不可能拿出多少余钱剩米来援助别人。可是一位老邻居的一席话却打动了在场的所有群众，他饱含深情地说：“恕忠兄一辈子积德行善，在乡里教小学，不知减免了多少贫困生的学杂费，请问在座诸位有哪一位没有在他那里接受过启蒙教育，有哪一家的祖先牌位、哪一年的春联不是他写的，他收过你们一毛钱的报酬没有？现在他的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在我们乡里算是第一个，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儿子辍学吧？我提议，就只当我们生产队少收了500斤稻谷，先让咬脐伢子^①将农村粮转成国家粮再说。”没有想到的是，老邻居的一席话一下子调动了群众的情绪，大家争相发言，盛赞我父亲的劳绩，一场社员大会竟然演变成为我父亲的追思会。最后，大家一致举手通过，由生产队长从仓库里称500斤稻谷给我，资助我上大学。这500斤稻谷也许在现代人的眼里没有多少价值，然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500斤稻谷却可以让我由农村粮转为国家粮，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帮助我走出大山，由五谷

^① “咬脐”是我的乳名。

地来到武汉，这座城市曾经是我人生道路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地方，它承载着家乡人民的纯朴与善良，承载着父老乡亲对我无限的期许和关怀！时至今日，我仍然能感受到那个炎热夏日夜晚带给我的丝丝清凉！

1963年，我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学校考虑到我家的实际困难，决定评为甲等助学金（全班仅两人），每月补助生活费13.5元，还不定期给予衣物补贴，可凭学校拨发的有价证券到武大商场领取自己合适的衣服和运动鞋。记得有一次，我刚领到一套新衣服，洗过后晾在外面晒，一不小心竟被小偷偷走了，系里领导知道后，又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给我重新添置一套。我母亲知道这件事后，深受感动，为确保我大学五年有足够的学杂费，尽量减轻学校的负担，我的母亲毅然决然将祖遗的房屋卖掉，自己却带着我年幼的妹妹住进了临时搭建的“直屋”里^①。在学校党委和历史系总支以及校、系两级行政领导的关怀下，在亲人的呵护下，我衣食无忧地在武汉大学生活了整整五年。我深知，这样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我的学习时间抓得很紧，每天早晨总是第一个起床，晚上总是最后一个睡觉，节假日也不休息，每天除上课之外，多数时间都在文科图书馆或学校老斋舍图书馆学习，因为在这里我可以在历史王国里忘情神游，博览古今中外历史典籍，度过了我人生道路上一段难忘的岁月。按照学校原定的计划，我们历史系安排三年时间将所有必修课程学完，一年时间撰写毕业论文，再安排一年时间参加社会实践，即到湖北山阳县参加“四清”运动。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初夏，

^① “直屋”为临时搭建的一间长方形的房屋，中间用砖墙隔开，前面为厨房，后面为卧室，我们一直呼为“直屋”。我母亲和妹妹在此居住六年，我参加工作后，始重建新住房。

当我们的必修课才刚刚学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武汉大学很快陷入了“大批判”的漩涡，几乎每天都要召开“批斗”大会，批判所谓的“三家村”、“四家店”，批判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说白了，就是要批判关心和教育过我们的校、系领导，批判为我们排忧解难、诲人不倦、令我们肃然起敬的老师，这当然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学校各单位特别是历史系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一批受蒙蔽的学生很快成立了所谓的“造反派”组织，男生称“义和拳”，女生称“红灯照”，高音喇叭震天响，大字报漫天飞，接着便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无休止的“武斗”。我不愿意介入这种丧失理智的派性之争，更不愿参与“武斗”，于是，我选择当了一名地地道道的“逍遥派”，一如既往，每天奔波于图书馆、资料室，准备撰写毕业论文；可是在“武斗”不断升级、人身安全尚且得不到保障的混乱状态下，谁还能静下心来写文章呢？

1968年底，我们年级30名毕业生被“扫地出门”，分别被派往农村、国营林场、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我被分配到解放军某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植水稻，由于那里是湖区，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仍需采用牛耕，因此，连队养了不少耕牛，需要有人放牧；由于那里的生活条件较差，加之“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大学生情绪普遍低落，因此，在分配劳动任务时，大家谁也不愿意去当“放牛娃”；我想，既然是来进行劳动锻炼的，就应该不怕脏、不怕苦；况且，我在童年时代也在禹山脚下放过牛，觉得劳动量不是很大，自己完全可以胜任，何不乘此机会抓紧时间学习呢？于是，我便承担了养牛的“苦差”，每天清晨，我便赶着牛、唱着歌来到湖边湿地去放牛，也别有一番情趣。我抓紧“牛背”上的时间学习专业和外

语，以补偿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去的时间。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我的日语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历史专业基础也更加扎实了。1970年从军垦农场出来，我被分配到岳阳县人民生活服务站，该站本来是管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公司包括饮食服务公司、蔬菜公司、肉食水产公司、副食品公司等等，这已经与武汉大学所学的历史专业很“不对口”了；但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被分配到该站所属饮食服务公司的岳阳饭店去炸油糍粑，开始思想斗争很激烈，不太想去，甚至有过“解甲归田”的想法。当时普遍流行着一种时兴的说法：“只有革命工作选人，没有人选革命工作”，毫无疑问，炸油糍粑自然应当归属于革命工作的范畴，既然如此，我也就别无选择了。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发现只要每天早点起床，干到8点钟左右，待到人们都吃过早餐上班之后就可以休息了，每天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三四个钟头，这给我自学腾出了大量时间；附近群众听说有个武汉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在炸油糍粑，将这件事作为新闻来传播，很多人都纷纷跑来凑热闹，以至每天早晨在岳阳饭店门口排起了长队，一时间，生意颇为“红火”。但是，没过多久，适逢县里搞机构改革，人民生活服务站与人民生产资料服务站合并成为商业局，也许是因为考虑到我在岳阳饭店炸油糍粑还干得不错，新成立的商业局领导将我安排在政工组，具体工作就是总结商业系统先进个人的经验，撰写典型材料，这项工作我倒是乐意为之，因为一方面可以提高我的写作能力；另一方面，我也从这些先进人物身上学到很多优秀品质，特别是那种干工作不分贵贱、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没齿难忘。我暗暗下定决心，今后不管上级分配我做什么工作，我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以期将来在历史研究方面有所收获。我

在商业局工作将近三年时间，也并没有天天呆在机关，除帮助先进典型撰写材料外，大部分时间都被抽调到县委农村工作组到相对较为贫困的地区“办点”，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尽快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我先后在岳阳县的康王公社奇家大队、箴口公社箴口大队、花苗公社洞口大队等10多个大队办过点，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帮助那里的群众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推广多种经营，还搞过生产培植，扩大种植业和养殖业，效果较好。特别是在花苗公社洞口大队，我在那个山区大队整整工作了一年时间，使我所在的生产队社员纯收入比上年增长了10多倍，离开时，社员擎着红旗，敲锣打鼓，夹道欢送，使我深受鼓舞，因为我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1973年，岳阳县商业局党委派我到县“五·七”干校轮训。名曰“轮训”，实际上是进行劳动锻炼。干校的主要任务除早晨和晚上短时间学习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就是开垦荒山，种植蔬菜，因山地距校较远，挑一担大粪要走一公里多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往往累得大汗淋漓，一般干部望而生畏，我考虑到自己还算年轻，便主动揽起了这份又脏又重的活儿。不知不觉半年过去了，干校领导认为我“表现好”，便将我留在干校任教。不久，县“五·七”干校改为县委党校，我便理所当然地担任党校理论教员，并于197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担任岳阳县党校理论教员的五年时间里，我仍然初衷不改，执著追求，坚持用业余时间学习历史；结合本职工作，我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论著，列宁关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论著，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著都通读了一遍，写下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这使我的理论素养大大提高。

1974年，我被调入平江县公安局工作。来到陌生的平江县城，干起了完全陌生的事业。这对于我来说，无疑又是一场新的